

文心雕龍卷第一

原道第一

梁通事舍人劉勰

張立齋學術文存 張立齋 著

文心雕龍 註訂

WENXINDIAOLONG ZHUDING



文心雕龍
註訂

張立齋
學術文庫
張立齋
著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文心雕龍註訂/張立齋著. —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0. 4
(張立齋學術文存)

ISBN 978 - 7 - 5013 - 4006 - 4

I. 文… II. 張… III. ①文學理論—中國—南朝時代②文心
雕龍—註釋 IV. I206.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179449 號

特約編審 李愛冬 張廷銀 郭又陵

書名 文心雕龍註訂

著者 張立齋著

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原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發行 010 - 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傳真) 66126156(門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中心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河北三河弘翰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張 15

版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數 395(千字)

印數 1 - 3000(冊)

書號 ISBN 978 - 7 - 5013 - 4006 - 4

定價 46.00 圓



張立齋遺像



上：張立齋、劉偉淑夫婦合影

下：張立齋全家合影



序

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學者張之宇、張之丙姊妹因主持張學良“口述歷史”而聞名中外。但是在未見面之前，因我孤陋寡聞，並不清楚她們就是張立齋先生的女兒。2007年，旅美多年的張之宇、之丙二女士來國家圖書館訪問，我接待她們，以為是例行公事。但是，當我得知他們就是張立齋先生的賢媛，並且看到先師詹鏐先生寫給張之宇女士的信件時，一下子就消除了距離，沒了客套，聊得比較投緣。

張立齋先生是臺灣著名學者，清末師從羅振玉和金梁，研究訓詁考據、殷墟甲骨，致力於書畫活動。1949年遷海外，後去臺灣，曾經任教於東吳大學、政治大學和文化大學，講授金石、訓詁之學，《論語》、《老子》、《文心雕龍》也是他的主講課程之一。1967年在臺灣正中書局出版《文心雕龍註訂》，1974年出版《文心雕龍考異》。這兩部書在臺灣頗有影響，著名學者王更生先生即評價《文心雕龍考異》，對校勘頗有貢獻。1995年臺北“中央研究院”首次收集古籍文獻電子資料，《文心雕龍》研究著作選了三部：除范文瀾《文心雕龍註》、詹鏐《文心雕龍義證》外，張立齋先生的《文心雕龍考異》亦列其中。可惜上個世紀的60、70年代，由於兩岸交流尚少，這兩部書，在內地很少

得見。1982年，先師詹鎔先生在北京科學院圖書館發現《文心雕龍註訂》，借到家中細讀，鈔錄了很多“卓越的見解”。1984年，到美國講學，又在威斯康辛大學圖書館借到了《文心雕龍考異》。詹鎔先生編著《文心雕龍義證》，對二書多有徵引，“以便在大陸傳播”。

《文心雕龍註訂》和《文心雕龍考異》雖然出版年代有先後，但《文心雕龍考異·序》說，“此稿始於編《註訂》時”，實則是同一時期編寫的著作，是兩部側重不同而又可以互補的書，《文心雕龍考異》側重於不同版本文字的考校，而《文心雕龍註訂》則致力於文義的註解。

《文心雕龍考異》據英國藏唐寫本殘卷、涵芬樓影印之嘉靖本、哈佛圖書館藏萬曆楊升庵批點梅慶生音註本、哈佛藏凌雲本、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藏黃叔琳集註及紀評合刻本五種，旁參《太平御覽》以及范文瀾註本、楊明照校本、王利器新書，考校《文心雕龍》文字。“茲就唐本十餘篇中，王氏失校者，有廿餘條，楊氏失校者，達三百四十餘條”。“且唐寫本原為草體，娟秀有法，西陲古卷上品，蓋中唐學士大夫之筆，二氏於諸篇中之天與之、祀與祝、復與履、詰與誥、哲與晰、秘與祕、彌與珍、照與昭、祝與說，間率依稀莫辨，以意誤從”。“至於亡忘、勳績、解懈、唱倡、撰選、宛婉、旁傍、曜耀、卻郤，皆於古為通之字，有典籍可按，而二氏率以應從某從某者，何疏略至於是歟”。對范文瀾註、楊明照和王利器校，多有補充和訂正。如《宗經》註，引班固《東都賦》“天下之奧區”，以證“洞性靈之奧區”唐寫本和范註作“區奧”之誤。《體性》“仲宣躁銳”，舊本皆作“銳”，范註以《程器》“仲宣輕脆以躁兢”，疑為“兢”。王利器和楊明照校改“銳”為

“兢”。《文心雕龍考異》則引《左傳》哀十一年：“子羽銳敏。”註：“銳，精也。”又《方言》：“鉋、銳亦猶躁銳也。”以證王校和楊校改字之非。《通變》“夏歌雕牆”，梅本、凌本和黃本皆作“雕”。而楊校據《玉海》引“雕”作“彫”。《文心雕龍考異》按：“雕彫古通，《廣韻》彫又作雕。”證楊校之非。又如《程器》“潘岳詭禱於愍懷”，黃本“禱”作“譎”。《文心雕龍考異》指出：“此指潘岳草禱神之文，受賈后之旨，以害愍懷太子也。詭禱本此，禱字不誤。……黃本作譎非，王校從黃本改尤非。”判斷多有據，足可與范註、王校、楊校相互補證。

《文心雕龍註訂》，其“前言”說明目的甚清，就是張立齋先生把自己數年講授《文心雕龍》期間，積累下來的“不下千有餘則”對文義的研究，寫進書中，“一以正諸本之謬失，與補其所未備”。按其體例，實則分為兩個部分，其一是解題，揭示每一篇的篇旨，對我們把握篇旨頗有啓發。如首篇《原道》，“立齋按……本者，溯其根本之謂。此原道者，原文心之道，文心之言道，自然之道，原其自然成文之道也”。而在隨文註釋中，著者一再申明此意：“道本自然，文由天成，故彥和屢言自然，此文心為書，第一要旨。”這樣的詮釋的確是正確把握到了《原道》的理論核心。又如《宗經》題解：“宗，主也。首章原道，言文章之由來，概本自然。此章宗經，言文章精練，概主群經。”不枝不蔓，緊緊扣住文章來講題旨，抓住了根本。其二是註釋。對舊註多所補正，並且時有勝義。比如關於《原道》篇“文之為德也”這句話的理解，范文瀾註：“按《易》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彥和稱文德本此。”《文心雕龍註訂》指出，《小畜》之言與《文心雕龍》的“文之為

德”不相侔，“文德”與“文之為德”有殊，文德重在“德”字，文之為德重在“文”字，德與得通，“言文之為德者，觀其效，而察其所得也”。“言文之為德，明斯義之體與用，大可以配天地也”。在這段註裏，著者一方面糾正了范註之誤，另一方面，對“文之為德也”，作出了個人的解釋，應該是我們見到的各家解釋中，關於體用說最早的解釋之一。

20世紀的60、70年代，在內地《文心雕龍》研究著作尚只有為數不多的幾部，如范文瀾《文心雕龍註》、王利器《文心雕龍校證》、楊明照《文心雕龍校註》寥寥數種而已。餘則多是選譯書，如60年代出版的陸侃如和牟世金《文心雕龍選譯》、郭晉稀《文心雕龍譯註十八篇》等。而在臺灣，這一時期，已經進入《文心雕龍》研究的重要時期之一。僅70年代，《文心雕龍》的研究著作就有10餘種。但是，關於不同版本文字考校和註釋的書，也不是很多，所見者也只有潘重規《唐寫文心雕龍殘本合校》一二種而已。所以這兩部書的面世對於龍學研究就顯得尤為珍貴，它與內地和臺灣這個時期的幾部龍學校註著作一起，代表了那個時期《文心雕龍》文字整理和校註的水平。

當然，誠如作者在《文心雕龍考異》序中所言，由於著者身處環境的限制，見到的版本不多，加上那個時期兩岸學者的隔膜，也影響到了著者對問題的判斷。而且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文心雕龍》作為古代文學理論的重要著作，引起了學術界廣泛關注，研究著作如雨後春筍般一下子冒了出來。龍學無論在內地還是臺灣，都成為顯學。其代表性的成果，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有了新的突破，研究之深細，自然也是後來居上。儘管如此，並不影響張立

齋先生這兩部書對《文心雕龍》研究所作出的貢獻，並不減弱它們的存世價值。尤其是對於內地讀者來說，這兩本著作流傳較少，使用不很便利。如今之宇、之丙女士授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橫排再版《文心雕龍註訂》和《文心雕龍考異》，相信能嘉惠學林，方便更多的學者研究利用這兩部書。

詹福瑞

2009年8月22日

Preface

Wen-Hsin Tiao-Lung was the work of Liu Hsieh, who lived in the sixth century. It is the outstanding treatise in the field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 China. In the long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re have not been lacking critical essays of high quality, but they are mostly limited in field and fragmentary in presentation, although they contain a rich mine of genuine insights. *Wen-Hsin Tiao-Lung* is quite unique in that it is at once systematic, comprehensive, analytical, and withall full of profound philosophic insights and piercing literary apperceptions. The author was a lover of literature and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nd at the same time he was steeped in the contemplative wisdom of Buddhism and Taoism. In fact, in his last years he became a Buddhist monk and was given the name of Hui-ti (慧地) by the emperor Wu of Liang.

The title of the book literally means *carving dragons on the literary mind*. In plain language it signifies the tracing of the subtle lineaments and vital tendencies in the literary mind. All that I need to say here is that the contents of the book are worthy of its title. Its dominating place in literary criticism is recognized by all Chinese scholars. Incidentally, it is worth mention-

ning that it has been ably rendered into English by Professor Vincent Shih.

The present book, *Wen-Hsin Tiao-Lung Chu-Ting (or Annotations and Rectifications of Misprints in Former Editions)*, is from the hands of Professor Chang Li-tsai of the National Cheng-Chih University in Taipei where he has been teaching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for many years. Two years ago he was invited by the Seton Hall University in New Jersey to give lectures on Chinese culture, in a summer program directed by Dr. John B. Tsu, which were warmly received by the students.

Annotated editions of *Wen-Hsin Tiao-Lung* first began to appear only since the Sung period. The Sung edition was soon lost. The Ming edition by Mei Ching-sheng was later superseded by Huang Shu-lin's edition of the late Ching period, but even Huang himself admitted certain deficiencies in his annotations. To some extent they were supplied by the works of later scholars. But even the combined labors of all these erudite scholars left much to be desired. Finally came Professor Chang Li-tsai, who has spent five to six years in preparing this annotated and critical edition, which embodies all that he considers worth preserving in the notes and comments of his predecessors through the centuries, together with the results of his own research.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which I must admit is very limited, I feel warranted in recommending this book to the public a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and accurate edition of *Wen-Hsin Tiao-lung*.

John C. H. Wu

(*Wu Ching-hsiung*) 吳經熊

Professor of Asian Studies (On leave)

Seton Hal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March 19, 1967

注：此篇序文為本書 1967 年臺北初版序。

《文心雕龍註訂》讀後

我對《文心雕龍》一書只做過一般學習，對訓詁之學更是敬而遠之，殊多懵懂。此次以膚淺之體會，管窺蠡測而躋登宏著，十分惶恐。

《文心雕龍》體大思深，論析精密，影響中華文明千餘年。這部巨制為歷代學人所關注，自清以降，更是漸成一門“顯學”，研究者日衆，兼及中外，論著頗豐。張立齋先生所著《文心雕龍註訂》一書，以獨到之認知，精闢之詮釋，全面把握其奧義，力求還原該書思想真實，以期傳承文脈，啟迪後學，在諸多相關著述中，堪稱上乘之作。這一全註本自1967年在臺灣第一版問世，不斷再版，我所讀者為1981年第7版本。此書是臺灣龍學研究領域中一部重要著作，被譽為見解“精審”，且“行文簡要”（臺灣王更生教授語），臺灣的《臺灣近五十年來〈文心雕龍〉研究》（2001年出版）和大陸有權威之《〈文心雕龍〉研究史》（2001年出版）都對先生及所著二書（《文心雕龍註訂》、《文心雕龍考異》）有比較詳細的介紹，並且評價很高。詹鎔先生所著《文心雕龍義證》一書也有很多徵引介紹。

張先生以其淹通經史、博曉百家的淵知，善思明辨之睿見，以高屋建瓴式的分析與不囿於前人之見的膽識闡發《文心雕龍》一書的意旨，並進行了艱辛的訓詁工作，寫出

這部思想深刻、多所發明的全註本，對學術研究與教學作出很大的貢獻。

先生在《自序》中指出“古籍淵深，不加註釋，難期誦讀”。劉作“歲歷千年，又當尚文之季，陶埴經史，廣博精練，必賴註詳，始克暢誦”。因而，對前人已有的若干種註本，在肯定其重要的貢獻成就之後，提出《文心雕龍》一書“藏用浩然，荒落待墾，所在仍多”，所以有《註訂》之作，“一以正諸本之譌失，與補其未備”。

註和訂是相互關聯不可分的，由於註者之見仁見智，“註”就可能在或闡明作者之意，或斷以己意之中，時有失誤。正如韓愈所說，“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註紛羅，顛倒是非”，後世之註前賢作品，亦是同樣情況。王充所云，“二論相訂，是非乃見”。“訂”是註釋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個重要艱巨，且具體而微的部分。由於不斷的訂正，推進了註釋的完美和正確。

先生的《註訂》之作，鞭辟入裏，對揭示原意有獨到論見，給讀者、研究者以啟發，極具參考、指導之價值。

先生在註訂中，運用了有關版本、校勘、訓詁、辨偽、考據以至音韻等等傳統的治學方法，合理闡釋，周詳舉證，質疑糾誤，做出論斷，其中很多獨到之見，發人深省，對理解劉氏原著有重要意義。

首先，先生對這部體系完整的評文巨作，有貫徹全書的理解與把握。因之，對作書的宗旨、每篇要義、五十篇之間的關係都做了深刻的論述和確當的註釋。在自序中，先生對《文心雕龍》一書做了總的概括評價：“系古今，綜百體，立規範，示經緯”，是評文一類著作中“最稱精備者”。在《序志》篇案語說明本書“道法自然，書尚宗經，

人尊周孔”的宗旨和思想傾向，並在對全書的分析與註訂中一以貫之。每篇分析，雖篇各有旨，總不離其宗。立論釋義，皆立足於通觀全書，把握主旨，持論有據。因之，在第一篇《原道》中，就正面闡述了以往註“文之為德”混淆於“文德”之疏誤，體現出對原著主旨的理解與運用。這個例子已被學術界公認確是精切之見，確實是正確領會劉勰之用意又有所發揮。這種情況在《註訂》一書中不乏例見。註釋時以“釋事忽義”為戒，並且批評了那些“疏於體要”至於附會曲解的缺失。

《序志》一篇原文一開始即解釋“文心”，先生指出：“此節釋本書命名由來，言為文之用心者，釋文心之義。舉《琴心》、《巧心》云者，明心字所本……”指明劉氏於《序志》篇總結全書旨歸，是講“為文之用心”，從而也糾正了那種認為文心之作與佛典體制格式相近乃是受佛典啟發的說法，復本清源。

先生在闡述或辨析各篇要旨或詮釋時，既考慮到全書主旨，把握原義予以闡明，有時也做補充發揮，切中肯綮。以《徵聖》篇為例，說“徵之於聖以為法，則而效之，以勵乎文學也”，又據篇中所言，指出“是知徵聖者，徵驗於孔子也”，分析得出本篇所論“以人為主”，而“聖指孔子，兼及公旦”。所以在本篇中，那種泛談以為周孔是並列者，說法不確。又談及《宗經》篇以文為主，也是把孔子文看成“為文之法”的範則。另外，論者也曾指出先生在《體性》篇，對“八體”、“通變”之發揮“簡要通暢”，補充了劉氏之論（見《文心雕龍研究史》252頁）。

先生在對前人註釋之選取與肯定時，也依循其是否合乎劉氏原意與解釋是否確當之原則，如《宗經》中關於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義，各家註釋所據不同，先生認為可取孔安國之解，說孔解比賈逵在《正義》中解釋更好，並講出了通達的見解，“偽書所取，亦自有其沿襲，不可全廢”，並不拘拘於今、古、正、偽之見，只應取其合理準切（同時，在書中也有批評取於偽書不恰之例）。於此，聯想到先生在對他人之著進行糾謬的同時，也有不少予以肯定、同意處，常見有“×註是”“×論是”的說明。這些，都是先生治學以讀者、學子獲得正確知識為準則的體現，取其是，糾其非，是嚴肅的治學態度。

其次，先生所作註釋博而確。博指先生讀見之廣，但在註時，並不以多為勝，而是要求確。這樣，既見研究功力，也符合教學所需。舉例如《原道》篇中，“幽贊神明”贊字之辨，指明用“讚”字之不確。先用《說文》說明漢以前無“讚”字，指出顧〔千里〕註之非；又以別本“當存古舊”批評孫〔貽讓〕氏輕別本之囿於偏見。然後舉“贊”字之義有三，用作“明”解之義與《易》說卦義同，“幽贊”應作“深明”之解，方是確切。駁誤糾失，明白有力，論斷清楚可信。先生在《自序》中曾談到註家之註原作，若是“務求博覽”而“少所折中”、“拙於發明”，就非“佳製”。因之，我們看到，先生雖亦重引證卻目的明確，即是為了解釋明白、準確，表明自己看法。《樂府》篇中“怨志詖絕”一處，先生將“詖絕”釋為“形（容）起落不定之勢”，引《漢書·禮樂志》“天門開詖蕩蕩”，註“詖，逸出也”，《離騷》“萎絕其何傷兮，”註“絕，落也”。此句與上句“艷歌婉孌”在本文中同是形容聲音的，而不是講感情行為。“詖”字在晚清以前的諸本《文心雕龍》中，用此字者多。但也有將其定為“詖”的，如唐寫